

国际政治变数对全球贸易增长的影响

□ 陈建奇

政治变数对全球贸易的三重冲击

世界关注全球贸易的发展，重要原因在于国际贸易成为推动各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通过开放的经贸合作，有助于促进生产要素全球流动，提高世界资源配置效率；有助于促进国际分工水平提高，推动各国生产力发展进步；有助于延伸及拓展市场边界，扩大经济发展空间。2016年全球GDP达到75万亿美元，扣除价格因素，比1970年增长两倍多。而全球在公元0—1000年经济仅仅增长15%左右，虽然全球经济发展与诸多因素有关，但当代全球经济更快发展显然与全球倡导开放合作以推动贸易加快增长息息相关。

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全球贸易增速放缓，FDI等跨境资本流动规模大

幅波动，全球经济增速明显低于金融危机之前的水平，世界主要国家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复苏调整。在此背景下，世界主要国家期待通过APEC及G20等区域或者全球经济治理平台加强合作以推动国际贸易投资回升。但近年来政治变数对全球开放合作产生了较大扰动，对全球贸易产生三重冲击，可能构成全球贸易的较大不确定性。

首先，政治变数滋生贸易保护主义，某些国家希望通过大幅提高关税及非关税壁垒，对全球贸易人为设置新的障碍。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提出了针对某些国家大幅提高关税的设想，引发了相关国家采取报复性手段的风险。美国及其贸易伙伴如果都采取歧视性贸易政策，那么自由贸易的大门

就面临着关闭的风险，贸易持续增长的空间必然缩窄。特朗普新政还将出台限制移民法案及修建城墙以阻止移民进入，限制劳动力等要素流动。与此同时，特朗普新政还希望通过将其他国家列入“汇率操作国”等手段，对竞争对手进行汇率施压以获取竞争优势，此举可能滋生相关国家采取非关税壁垒的对抗措施，导致国际贸易陷入混乱。

其次，政治变数可能催生区域或者全球体系的重构诉求，使区域或者全球经济治理受到冲击，影响全球贸易持续增长的制度基础。当前英国脱欧已经进入实质性阶段，预示欧盟这一区域经济治理体系面临阶段性阻力，欧盟一体化进程出现了倒退现象。今

年法国总统大选，很多人担心倡导脱欧的总统候选人勒庞胜出，由此对欧盟产生新的不确定性。未来意大利等国家如果也出现脱欧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欧元可能面临崩溃的风险，促进欧洲自由贸易的欧盟制度体系可能面临崩溃，欧洲乃至全球贸易都将面临挑战。特朗普竞选总统以来，对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及世界贸易组织（WTO）等提出质疑，如果美国对相关制度提出挑战，那么全球贸易增长可能出现制度缺失。

再次，政治变数可能对全球价值链构成冲击，促使劳动生产率增速放缓乃至停滞，影响全球贸易的深化发展。全球贸易不仅是简单的商品服务的买卖，而且通过开放合

作能够推动国际分工水平的提升，促进全球合作。现实生活中可以看到大量国家进口商品不是为了消费，而是再次经过加工生产以出口到其他国家或者地区，这种价值链的分工合作增大了国际贸易的空间。当前政治变数可能促使世界主要国家各自为政，改变了深化开放合作的态势，此举必然对各国之间的商品要素流动产生影响，导致价值链分工合作缺乏必要的基础。没有自由贸易就难以对企业构成全球竞争的压力，也无法形成全球分工协作的环境，企业创新可能因此放缓，科技进步也将面临减速局面，劳动力生产率难以回避停滞风险，全球贸易深化发展的前景必然受到冲击。

政治变数对全球贸易的影响正在显现

虽然欧盟一体化等政治变数会如何演变仍然未知，但政治变数对全球贸易的影响已经开始逐步显现。政治变数核心问题就是不确定性，很少人能够准确预测未来将如何调整，即便有些机构做好了各种应对的准备，但政治变数复杂性决定了各种应对措施的局面性。特别是在当前“黑天鹅事件”频繁出现的情况下，社会对未来的担心大幅上升，企业等微观主体在全球开放合作中更加注重短期行为，长期投资会更加谨慎，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构成了跨国或者跨境合作的重要负面影响因素，全球贸易减速也

就在所难免。

当前政治变数对全球贸易的最直接影响是世界贸易谈判的弱化。特朗普执政后直接否定了奥巴马时期的TPP等经贸谈判，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也正在力推脱欧进程，欧美对外经贸合作不仅没有继续深化，反而出现了倒退。伴随欧美的经贸合作战略调整，有些国家对深化外部合作日益感到焦虑，有些国家被迫寻求通过新的渠道与美英等国展开合作。美英等政治变数引发的贸易谈判弱化动向，客观上对贸易伙伴的经贸关系产生了不稳定的预

期，由此对全球贸易产生外部冲击，全球贸易不确定的预期增强。

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克里斯蒂娜·康斯坦丁尼斯库研究认为，“欧洲和美国的政策不确定性拉低了整体全球增长率，从而对贸易产生了负面影响。在不确定性增加的环境下，企业可能会选择推迟投资和出口决策，消费者可能会减少支出。贸易协定解体可能也会增加政策的不确定性，对贸易增长造成伤害”。根据世界银行《全球贸易观察：2016年贸易发展》，全球贸易连续第五年增长缓慢，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陡增导致2016年贸易

增长率下降了0.6个百分点，2016年世界商品贸易增长仅略高于1%，低于2015年的2%和2014年的2.7%，这是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最弱表现。

国际贸易不仅已经受到政治变数引发的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而且正受到政治变数引发WTO等全球经济治理机制调整的影响。WTO自多哈回合谈判以来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但政治变数的加大无疑促使国际协调更加困难，推动全球一体化合作的政策受到质疑，WTO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受到政治变数挑战的问题突出。在此背

景下，有些国家开始诉诸于贸易保护主义举措。比如欧美加大对中国钢铁等商品反倾销、反补贴调查，欧美拒绝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美国加速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引发相关国家经贸关系紧张，等等。欧美等大国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开始产生负面影响，促使贸易保护主义等风险加大。

政治变数影响贸易增长的同时，还伴随着生产率增速的下降，这种问题的出现可能由于政治变数对价值链的冲击。《全球贸易观察：2016年贸易发展》报告指出，通过对2015年40

个国家13个行业的分析发现，参与全球价值链是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推动力，全球价值链参与率每上升10%，就能带来生产率上升近1.7%，当前全球贸易增长缓慢反映出全球价值链停滞不前的影响。综合来看，虽然社会期待全球经济能够像G20峰会所倡导的那样尽快实现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的目标，但政治变数影响将继续释放。可以预计，未来伴随着特朗普政策的不断调整，欧洲多国大选等事件也不断发酵，政治变数对全球贸易的不确定性可能增大。

应对政治变数问题重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创新

和则两利、斗则两伤，这个道理也适合全球贸易。政治变数加大对世界各国经济乃至全球贸易的冲击，各国都无法独善其身。要应对政治变数对全球贸易的影响问题，重点须加强国际协调，让世界各国政治家更加深刻认识到开放合作是各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发展的唯一选择。贸易保护主义及孤立主义不仅无助于解决当前世界各国的经济问题，更可能加大各国经济发展的挑战。当前，世界一些国家和地区出现反对全球化的声音，并非因为全球化无助于促进经济发展，

而在于全球经济发展过程中伴随着地区发展不平衡、收入差距扩大等问题，有些民众在全球化过程中未能受益甚至利益受损。因而，并非全球化大方向不对，而在于推进全球化进程的方法需要改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亟待创新完善。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作出了全球化符合历史潮流的判断，并提出了解决当前全球经济问题的四点倡议：一是坚持创新驱动，打造富有活力的增长模式；二是坚持协同联动，

打造开放共赢的合作模式；三是坚持与时俱进，打造公正合理的治理模式；四是坚持公平包容，打造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热议及认可，推动了各国对全球经济发展模式的反思，更重要的是给出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药方，即将合作共赢与包容性发展放在全球经济发展的突出位置，强调世界各国在全球化过程中不能以损害其他国家利益为代价，促进全球化参与各方都能从全球化进程中得到好处，推动世界各国更加平衡发展。

要构建合作共赢和包容性发展的全球经济治理新体系，核心在于世界大国的紧密协调，通过G20等治理平台推动当代经济治理体系完善。在此过程中，尤其需要重视中美合作，因为中美作为世界前两位经济大国和贸易大国，中美两国是影响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的核心力量。当前中美联系非常紧密，两国在全球某些领域的博弈不足为奇，但重要的是管控分歧，尤其应防范将经济问题“政治化”的倾向。中美应寻找时机，加快双边协定谈判，构建中美乃至全球的投资协定。中国应重视近年来

在区域以及全球治理体系中话语权逐步提升的基础，主动引导设置议题，引导美国认识到如果中美关系倒退可能付出的高昂代价，推动中美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中合作而不是对抗。

关于如何实现世界各国合作共赢及包容性发展的问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重要的战略选择。今年1月份，习近平主席在日内瓦万国宫出席“共商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高级别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深刻、全面、系统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联合

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55届会议2月10日协商一致通过“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社会层面”决议，呼吁国际社会本着合作共赢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加强对非洲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合作共赢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中，体现了这一理念已经得到广大会员国的普遍认同，也彰显了中国对全球治理的巨大贡献。虽然国际政治变数为全球贸易增加新的风险，但当前全球治理体系正在加速调整完善，未来有望不断为世界各国深化开放合作创造有利的环境。

（上接1版）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精准施策，强化责任，齐心协力打赢脱贫攻坚战，开创脱贫攻坚新局面

言必信，行必果。矢志不移，水滴石穿。全力打赢脱贫攻坚战仍然任重道远。在为取得成绩欣喜的同时，也要看到，个别地方为了政绩虚报脱贫、数字脱贫欺上瞒下的事例时有发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脱贫攻坚越往后，难度越大，越要压实责任、精准施策、过细工作。要防止形式主义，扶真贫、真扶贫，扶贫工作必须务实，脱贫过程必须扎实，脱贫结果必须真实，让脱贫成效真正获得群众认可、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

一是要加强对贫困地区贫困群众的倾斜支持力度。为打好脱贫攻坚战，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加强顶层设计，创新工作机制，先后印发《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省级党委和政府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办法》等一系列制度规定。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建立重大涉贫事件处置反馈机制的意见》，中央组织部印发《关于脱贫攻坚期内保持贫困县党政正职稳定的通知》。这一系列制度措施，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制定了时间表和路线图，为脱贫攻坚提供了根本保证。要在全面深入贯彻落实已经制定的制度的基础上，出台更多惠及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政策措施。要实施最严格的考核评估，开展督查巡查，对不严不实、弄虚作假的，要严肃问责。要加强扶贫资金管理使用，对挪用乃至贪污扶贫款项的行为必须坚决纠正、严肃处理。

二是要形成全社会参与脱贫攻坚的合力。按照党中央确定的“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脱贫攻坚工作机制，切实发挥好各级党委政府在扶贫工作中的核心作用。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做好扶贫开发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千方百计帮助贫困群众排忧解难，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时刻放在心上，把党和政府的温

暖送到千家万户。广泛动员全社会力量，支持和鼓励全社会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参与扶贫。鼓励社会资本进入扶贫领域，大力发展光伏发电、农业观光、花卉苗木、农村电商等产业，加大产业扶贫力度。充分挖掘社会扶贫的巨大潜力，完善专门支持政策，建立广泛参与的信息服务平台，打造扶贫攻坚人人皆可参与的良好生态，把社会扶贫巨大潜力转化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源动力。

三是要激发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脱贫攻坚的内生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干部群众是脱贫攻坚的重要力量，贫困群众既是脱贫攻坚的对象，更是脱贫致富的主体。扶贫开发不能“等”“靠”“要”，贫困地区的内生动力一样至关重要。一方面，扶贫先扶志。要把贫困群众积极性和主动性充分调动起来，引导贫困群众树立主体意识，发扬自力更生精神，激发改变贫困面貌的干劲和决心，靠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另一方面，扶贫必扶智。让贫困地区的孩子接受良好教育，是扶贫开发的重要任务，也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薄弱环节和短板依然在乡村，在中西部老少边穷岛等边远贫困地区。要扎实推动《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的贯彻落实，继续加大农村教育投入力度，在缩小城乡教育差距、补齐乡村教育短板上取得更大进展，为带动贫困地区脱贫致富提供有力智力支持。

行百里者半九十。越是接近目标，越要坚持不懈。2017年是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深化之年。在2017年的新年贺词中，习近平总书记再一次强调：“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掉队！”3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人大四川代表团审议时指出，防止返贫和继续攻坚同样重要，已经摘帽的贫困县、贫困村、贫困户，要继续巩固，增强“造血”功能，建立健全稳定脱贫长效机制，坚决制止扶贫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努力写好脱贫攻坚的历史答卷，早日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

（上接1版）一是工作方式具有权威性。政府向中央企业派出监事会，独立开展监督检查，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不参与、不干预企业经营决策和经营管理活动。除外派体制外，由省部级干部担任监事会主席，保证监督的权威性。二是监督内容具有综合性。将外派监事会纳入国资监管整体框架，并且作为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充分体现了出资人管理和监督职能的有机统一，形成发现、分析、报告和解决问题的工作闭环。监事会主席及时反映中央企业的情况，提出相关的工作建议，为国资委履行出资人代表职责提供了重要依据。三是监督方法具有系统性。外派监事会常驻企业开展当期和事中监督，对企业决策程序不合规及决策内容存在重大风险的事项，及时向出资人报告，及时提醒、叫停或作相应的处理。通过监督企业重要子公司，包括境外国有资产检查，延伸出资人监管链条，有效弥补对企业末梢监督的缺位问题。

把握外派监事会的工作定位，明确重点职责。按照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的要求，充分发挥监事会制度上的先发优势、常驻企业的驻在优势以及熟悉企业的比较优势，发挥监事会作为出资人监督专门力量的重要作用，强化企业风险预警，加大督促整改力度。一是强化问题和风险导向。牢固树立底线思维的意识，把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要牢固树立应当发现的问题而没有发现是失职、发现了问题不报告是渎职的监督理念，进一步聚焦监督主业，及时反映企业决策和运营过程中有可能危及企业国有资产安全、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或者侵害国有资产权益的问题和事项，特别是违法违规违纪的线索，发挥检查、侦查前哨和预防预警功能。二是突出监督重点。重点围绕重大决策和运营过程中涉及国有资产流失的事项和关键环节，以及董事会和经理层依法依规履职情况，围绕“三重一大”事项，特别是要对企业内控体系及有效性进行检查。三

是落实监事会监督责任。监事会与企业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企业领导班子对此负有经营管理责任，监事会负有监督责任，共同对出资人负责。

在体制机制改革完善中保证监督的权威性、有效性。一是坚持外派监事会制度。对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继续实行外派监事会制度；国有参股、国有控股企业中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经国务院批准，也应继续实行外派监事会制度。二是保证监事会行权履职。落实知情权，把保障监事会知情权列入国资委对企业领导班子的考核项目。扩大建议权，对经营者违背诚信责任的行为随时提醒和纠正，国资委审议企业重大事项和研究企业重要人事任免应听取监事会意见建议。强化调查权，在工作人员配备、落实监事会工作经费上予以充分保障，授予监事会对企业年度决算审计机构提名权。三是强化监督成果运用。监事会提交的年度、专项、专题等监督检查报告是监事会监督成果的集中体现。强化监督成果利用工作，解决监事会反映的问题落落地，形成工作闭环。

整合监督力量，形成监督合力，切实发挥监督的作用

在整个国有企业监督治理体系中，除了监事会还有一些重要的监督主体。一是纪检监察监督和巡视监督。纪检监察监督和巡视监督属于党内监督，依据党章及其他党内法规等履职，主要是监督党员领导干部。二是审计监督。国家审计部门的监督是一种行政监督，目的是对财务报表是否合规、经营者经济责任落实等提出审计意见。三是企业内部监督。企业内部监督机构主要职能是监督所属企业，对企业自身领导人员的监督作用有限。在抓好监事会监督的基础上，要整合监督力量，形成监督合力，切实发挥监督的作用。

整合监督资源以提高监督效能。一是建

立高效顺畅的外部监督协同机制。整合出资人监管、外派监事会监督和审计、纪检监察、巡视等监督力量，建立监督工作会商机制，加强统筹，减少重复检查，提高监督效能。创新监督工作机制和方式方法，运用信息化手段核查问题，实现监督信息共享。二是健全企业内部监督机制。企业集团应建立涵盖各治理主体及审计、纪检监察、巡视、法律、财务等部门的监督工作体系，强化对子企业的纵向监督和各业务板块的专业监督。加强企业内部监督工作的联动配合，提升信息化水平，强化流程管控的刚性约束，确保内部监督及时、有效。三是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实现外派监事会监督与国资监管工作的深度融合。由国资委监督平台统一协调内外部监督力量，联合布置与实施监督，建立各类监督信息汇总机制，牵头制定整改落实方案，协调国资委职能部门、企业有关人员参加，实现监督协同。

完善制度保障和能力建设。一是完善监事会制度。应结合监事会工作实际，抓紧修订《国有企业监事会暂行条例》，与《公司法》《企业国有资产法》等法律法规做好制度衔接。抓紧出台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外派监事会工作的有关措施，推动外派监事会监督检查成果在国资委内外的运用。二是完善监事会组织体系建设，为监事会工作搭建支撑机构。国资委应充分发挥监督部门前线和后台的整体合力。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及其主要负责同志要正确对待监督，自觉接受监督，积极主动支持、配合监事会的工作，落实监事会的监督责任，为监事会履职提供强有力的保障。三是加强监督队伍建设。不断吸引社会高素质人才，选派政治坚定、业务扎实、作风过硬、清正廉洁的优秀人才，进一步充实监督力量。加强教育培训，重视提升监督队伍的综合素质和专业素养。建立外派监事会可追溯、可量化、可考核、可问责的履职记录制度，健全责任倒查机制。

（作者系国有重点企业监事会主席）